

# 经济社会学：理论、方法与研究<sup>\*</sup>

周长城 吴淑凤

**Abstract:** The growth of economic sociology as a sub-discipline is particularly welcome because it addresses some of the key issues of social science, particularly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it also raises some fundament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hemselves and the use of the very term “economic sociology” in particular. The authors discuss some fundamental questions regarding economic sociology in this paper. First of all, the nature, such as cross-disciplines, independence and so on, will be discussed; Secondly,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 sociology will be explored, it will deal with the philosophical division betwee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the multiple fron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Thirdly, authors introduce some issues concerning political economic sociology, efficiency and social custom, and the interdependence of payment systems.

—

## （一）对“经济社会学”内涵的重新认识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熊彼特是“经济社会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提出“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更多地强调经济，而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学并不一致。即使就经济学而言，“经济”制度最初指罗马社会的家庭管理（“Oikos”）；而熊彼特的纯粹经济学概念则过于狭隘。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而是经历了无数曲折和往复，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各个时代的基本假设和定义。

对于“经济社会学”自身含义的认识问题更为严重。通常，人们习惯于认为经济学倾向于演绎而社会学倾向于归纳，但是决不能以此推论经济社会学。因为，首先，对绝大多数学科的定义源自其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方法<sup>①</sup>；其次，如果经济社会学的目标是用社会学实证方法研究经济现象，则“社会经济学”的名称也许更加贴切。

由此将进一步引发社会学的身份危机，即社会学的真正研究领域是什么？孔德早在 1839

<sup>\*</sup> 本研究系武汉大学学术骨干基金资助项目“新经济社会学理论及其方法”的阶段性成果。

① 物理学研究物质，心理学研究心灵，生物学研究有机生命，而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斯密认为经济学应研究国际的特征与原因；杰文斯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演变的科学；马歇尔认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对一般经济生活中人的研究。显然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是从经济学科学的研究对象来定义经济学的，而不是从研究方法来定义的。

年就正式提出“社会学”，并将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制度的科学”。两位开拓者都是以分析对象而非分析方法定义社会学。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也将经济学定义为“对社会制度与经济系统的研究”。这种用“社会制度”定义的经济学与迪尔凯姆对社会学的定义以及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的定义极为相似。20世纪3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的出现解决了经济学与社会学重叠的问题。经济学用理性选择方法严格限定出某些结果，而社会学则解释这些结果。这就是由经济学家罗宾斯(Robbins)与社会学家帕森斯(T. Parsons)所达成的“君子协定”。然而今天，由加里·贝克尔等人倡导的自成体系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宣称：“经济学方法具有普遍性，能够适用于一切人类行为——所有人类行为都可作为行动者从一系列固定偏好中实现效用最大化，并使得信息积累量达到最优(贝克尔，1989)。科尔曼则将经济分析用于社会现象，并融入了“社会资本”的思想。最近以来，区分经济学与社会学又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但所面临的环境已发生变化，数学日益在经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而淡化了对现实经济制度与经济系统运行的全面、深刻的认识。<sup>①</sup>因此，现在经济学家使用“经济社会学”概念并不是为了将社会学方法用于分析经济现象，而是要挽回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经济学原有学科内涵。

## (二)研究起点：明确的学科目标与学派归属

对经济社会学内涵的认识使我们意识到，要实现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必须促进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有效合作与协调。为此，首先需要明确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的学科目标与相互间的学科分工。作为社会科学，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学术研究兴趣、学术发展渊源、统计方法运用等众多方面存在大量重叠与资料共享。但仅以此为由假设两门学科具有相同的学科目标则是十分危险而有害的。其次，如果只需要说明某一学科的目标，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合作就相对容易，但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目标都难以用一般而抽象的术语表达清楚。仅以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为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对实现经济学与社会学有效沟通的重大影响。

经济学发展史上学派林立，要弄清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家会在哪些领域与社会学家进行合作，必须首先区分经济学家所属的学派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抑或制度学派等。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与经济学合作与沟通的效率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家的学派归属。

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是什么”的不同解释将能够为经济学分类提供更为有效的标准。新古典主义将经济学描述为研究个人如何在时间、金钱、自然禀赋等稀缺资源的诸多使用方法间作出选择。其核心假设，如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中所指出的，即“理性化”。理性化具有与经济交易类似的过程——任何交易或行动所增加或减少的价值被记录并以“收益”、“损失”进行总量衡量，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遵循同一评判标准，并且经由数字计算。新古典派强调任何人类活动都是建立在偏好选择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否则该活动就不属于理性行为，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制度经济学(不同于将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运用于制度变迁而形成的新制度经济学或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如何实现跨越现时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以及由规范和约束所形成的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变化。经济学家对

<sup>①</sup> 当今要想在一所知名的欧美大学的经济学系谋取一个职位，即使对现实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十分了解，但若不是对数学十分精通的学者，简直是不可能的。像斯密、马克思、米尔、门格尔、马歇尔、瓦尔拉斯、凡勃伦、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都不可能在现今一流的经济学界找到工作。

各方面的规范与约束,如宗教、家庭等都备感兴趣。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行为只有通过社会规范才能被有效理解,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规范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制度形式,并建立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型。

经济社会学应该努力避免将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简单化、单一化的倾向,并能有效区分各个学科内部具有相似研究目标的不同学派。

### (三)制度与经济社会学

制度与经济社会学的关系,能够进一步反映出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学科目标和研究取向上的差异,以及其对经济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德加·格林(Terje Gronning)研究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制度的不同理解。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有关“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的讨论都相当激烈。“制度”既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又是社会学的一般概念,对经济社会学而言亦具有重要意义。对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如果从两门学科共同关注的“制度”概念着手,而不仅仅停留于一般意义的研究,就不仅需要认识“新”、“旧”制度间的关系,而且要将这种研究纳入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学之中。

霍德根森(Hodgson, 1988)比较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对于‘新’变化的准确内容,即使其拥护者也未达成完全一致”。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新”变化通过将理性行动者概念与个人创造或改变制度的方式相结合,更新了对于能动主体及其变化的认识。相对而言,“旧”制度主义却总是从分析“习惯”着手。理性选择理论用习惯进行解释研究,“习惯”同样“被认为对制度形式与制度维持至关重要”(Hodgson, 1988)。

社会学中,虽然仍有一些学者坚持标准的制度定义,将制度作为各种附带奖惩与报偿系统的稳定的社会规范形式(Jepperson, 1991),但“新”制度主义更加强调对制度的认识,并将文化作为制度的载体(Scott, 1995)。“构成制度的并不是规范、价值,而是那些在社会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准则、行为模式和固定化场景。与由组织、群体所抽象出的具有影响力的约束相比,制度是一种宏观层面上的抽象,独立于对道德的遵从。新古典制度学派不研究隐含的个人心理状况,因为认识模型中的情景框架将促使行动者拒绝任何新的变化……它研究那些强调个人如何按照社会分类来组织信息的理论……”(Powell & DiMaggio, 1991)。

经济学中,“新”制度主义试图促进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主义的融合,重点是强调制度化以及制度化中能动者的作用,并且降低了“旧”制度主义所强调的习惯的作用,但也会产生忽视制度化条件过程的危险而过多地强调制度产生于既定个体间的互动。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不同于经济学,它意味着再次强调文化和文化限制,一方面是出于对制度条件的强烈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制度的定义越来越抽象,“制度”成为一种规范行为的情景框架。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经济社会学对经济学与社会学中“新”、“旧”制度的讨论应有所选择,即,是遵循对制度的现有定义与理解,还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开拓制度研究的新视野。

## 二

### (一)方法论上哲学思维的整合与突破

经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面临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哲学思维上的背离。具体而言,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是古代二元论哲学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化,即分别代表了绝对主义哲学和相对主义哲学。哲学上,绝对主义认为道德规范的代际传递是道德与道德判断的外在资源,绝

对主义的道德权威独立于由其所控制和约束的个体,强调不分时间、地点适用于所有个体行为,否认任何偏离与例外。相对主义则拒绝代际间存在所谓的道德权威,强调道德只适用于当代人,要求建立一种相对的道德标准,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并且因时、因地、因具体的环境而异。

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家是当代绝对主义的代言人,社会学家则是当代相对主义的代表。当然亦有例外,比如迪尔凯姆就是一个道德绝对主义的提倡者,将社会看作一种代际道德权威。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也在《理想社会》中提出当代社会学包含了绝对主义倾向。以市场为例,经济学家将市场假设作为一种外在的、独立的、能在代际间实现的状态,市场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但却能够将固定化的外部规则施加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人。巴伯(Bernard Barber)称之为经济学的“市场绝对化”(absolutization of the market)。如果说社会学家将市场作为一种社会构建,经济学家则将市场作为一种自然构建,认为市场运行由经济规律控制,其绝对性就像控制行星运转轨道的自然规律。经济学的绝对主义性质,还表现为经济学家相信人类具有某些普遍特性,如“利己主义”、“机会主义”、“交易倾向”等等,因此,无任何时间限制的普遍法则,甚至适用于非资本主义、非市场化社会。

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哲学思维上的这种背离对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学提出挑战,经济社会学必须能够解决二元对立,通过方法论上的突破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经济社会学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两项重大进展:即哈里森·怀特的市场理论和马克·格兰诺维奇的社会嵌入理论。前者通过考察工业组织经济学和符号理论,发展出一种社会学的市场理论,强调市场是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社会结构;后者以经济学的交易成本为基础,创建了一种全新视野的社会学理论,强调经济现象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

经济社会学不再以推翻或忽略经济学为目标,而是充分借鉴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并将其整合到更宏大的理论结构中。尼尔·斯梅尔塞和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在《经济社会学手册》(Smelser & Swedberg, 1994)中指出,新经济社会学中“理论综合的传统与其巨大优势正在消失”。经济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跨越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哲学思维上的分隔,创立出新的理论综合。

## (二)多元视野中的学科建构

作为一门迅速发展的年轻学科,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不断变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亦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学的内涵在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碰撞中变化颇大,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取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市场网络分析中尤其如此。社会学则更多关注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研究以及扩大理性选择模型的适用范围,将经济社会学作为正统经济学的合作者而非竞争者。

在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经济学和社会学自产生以来,二者在概念、理论、目标、意义上的界限始终在不断地重叠、转化。早期学者如马克思、熊彼特、帕累托等人均是跨学科的开拓者。在经济学理性选择革命延及社会学以前,帕森斯就已经将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到社会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虽然与社会学在研究兴趣上完全不同,但某些经济分析方法,比如理性行为者模型、博弈理论等却为当代社会学所借鉴。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都试图借鉴对方的研究方法,但经济学家更为主动。譬如经济学对社会学“嵌入”理论的反应。“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努力与“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即德国历史学派)严格区分开来,从各个方面回击并返回到使经济理性镶嵌于社会制度,以提供信任,

降低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确保市场交易实现。可以说,具有社会学背景的经济学家通过引入社会学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转换为“社会资本”,从而用动态数学分析解释了满足市场需求的经济理性行为是如何嵌入社会制度的。

处于发展初期的经济社会学具有多元化的学术视野,因而能够避免被强大的、日益复杂化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吞噬。科林斯(Randall Collins)将经济社会学的多元化学术视野具体表述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分析层次。

### 1. 宏观历史的社会基础与经济交换系统的动态演进

首先,宏观分析层次上的经济社会学最接近于传统制度经济学,甚至可以包括波兰尼对前市场交换体系的分析以及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分析。诺斯(North)与托马斯(Thomas)的研究类似于韦伯,虽然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而韦伯则立足于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发展,研究更广泛意义上的制度支持系统和更为基本的财产交易。

其次,一些学者还研究了中国与日本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示出20世纪东亚经济模式独特的社会组织基础。另一些学者则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包括其存在的问题、市场转型过程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多样化改革。这些实证研究在比较分析方面将有助于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此外,对有关经济生产与经济交换的各种制度结构及其变化过程的研究是分析结构化的起因与动力,对经济配置的功能主义影响以及破坏经济制度的各种压力的有效工具;同时也为研究“社会资本”如何产生——是出于优化、生存,还是其他社会学方面的原因——提供了一种现实生活的解释。

最后,宏观历史层次的经济学还将涉及经济社会学当前最为薄弱的领域——全球经济或者世界体系。意识形态的阻碍导致这方面研究的匮乏。世界体系理论源于新马克思主义,始终比其他经济社会学流派更加重视经济不平等和经济冲突,其核心是康德拉契夫长波理论;而周期性经济危机、世界经济重心转换和金融交易与经济生产的地位转化等,则都是经济长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诱因。世界体系理论已经建立起由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所支持的规范而清晰的模型,将世界体系理论整合到经济社会学的努力也必将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

### 2. 中观层次:社会制度中的市场嵌入

中观层次的研究将有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其内容包括:用于减少不确定性并增进信任的社会制度;为了预测、解释、法律而导致的社会组织形式变化;财富与文化的交换;社会规范制度等等。中观层次分析亦最易导致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复杂的“供给—需求”模型替代,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选择从中观分析层次而非宏观历史社会学角度对经济社会学发起攻击。但是,经济学能否将中观层次经济社会学引入其原有的研究范式却不是中观层次本身所能决定的。也就是说,虽然经济社会学需要建立能够沟通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分析层次的理论架构,但从整体上涵盖并整合所有分析层次却决非易事。

### 3. 微观层次中经济交易的社会建构

经济社会学在微观层次上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市场竞争运行机制的各种替代模型。已有两种代表性的理论范式:(1)哈里森·怀特从纯粹生产者角度构建市场竞争模型——企业家通过生产者群体之间的相互监控来合理定位,寻求利益最大化。(2)维维安娜·泽尼泽尔(Viviana Zelizer)分析了因货币类型而异的各种特殊形式的经济交易,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关系随着该经济交易所具有的代表性、反复性和特殊性程度而变化。这些分析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而言是

一种强大挑战，它们所提出的有关价格形成、大规模生产以及收益的种种另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根基。虽然“嵌入”为运行新古典经济模式提供了社会语境，但微观分析的最终任务却表明，即使最具理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深刻的、内在的社会系统。

微观层次的社会学常常被作为一种市场网络分析方法，并在生产者网络、企业家配置、生产者—消费者网络、金融网络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虽然对各种分析模型的异同性与互补性的深入研究将会极大地丰富经济社会学的已有成果，但不同模型的切入点与目标并不相同：怀特模型强调生产者相互监督寻求利益最大化，因而与泽尼泽尔以货币类型区分经济交易的研究有所区别。而两种模型的侧重点又都与格兰诺维特所强调的建立不同社会结构间的联系大不相同。

### （三）避免“泛经济学主义”的两种极端

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社会学密切相关，其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亦源于两门传统学科。但随着当代经济学，特别是高度依赖数学模型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蓬勃发展，“经济学帝国主义”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所谓的“泛经济学主义”——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理性选择模型，并在实践中形成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两种极端。研究方法上的任何极端化都会极大地阻碍学科发展和进步。

经济社会学尚处于发展初期，在研究方法上无论是纯粹的理论抽象还是纯粹的统计推论，都没有明显的表现。但缺乏实证目标的“黑板式理论化”——在经济学看来，无论是否经过实践，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在黑板上完成推演和证明——与缺乏理论依托的“统计显著性”证明却广泛见于现代经济学、人口生物学以及理性选择社会学中，经济社会学的深入发展必需以此为戒（McCloskey, 1998）。

## 三

当代经济社会学的一些专题研究代表了经济社会学的前沿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趋势。<sup>①</sup>

### （一）政治学的经济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一直注重对制度和政府运作的研究。统治方式或管理方法是促进政治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相结合的关键领域之一。它特指能够对他人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行为，这些决策中的一部分由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政府制定，另一部分则由那些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非政府的私人机构完成。

生产领域（如同马克思所言）是一种权力范畴，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政府。斯密等人也曾指出，拥有权力的公司组织通过提高价格，转移成本，能够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征税，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政府行为。

政治学的经济社会学将本着非规范且尽量折衷的原则使以上研究内容扩展到其他可能的领域。例如，研究规则与去规则化时人们常常将两者对立起来，而经济社会学将研究这种选择

<sup>①</sup> 这里集中讨论了经济社会学的三个研究领域，有关经济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参阅周长城，1995，1998。

机制(比如是选择制定“规则”政策还是“越轨”政策)是如何形成并且运转的。

对财产制度的研究也是如此,即弄清为什么在某些过程中选择一些利益作为财产进行保护,放弃对另外一些利益的保护;而在另一些过程中,保护对象的选择结果却恰恰相反。

## (二)效率与社会习俗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对风俗习惯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在两门学科的独立推动下不断获得重新认识,加以改造创新。

作为效率阻碍的习惯与习俗。经济生活中社会习俗与惯例的作用虽然微小但却是持久性的。穆勒、韦伯、熊彼特都假定习俗阻碍了效率,效率只有通过打破习俗才能获得。但近来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却提出对习惯、习俗的另类解释,一种更接近于现实的心理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假设。

作为提高效率的习惯与习俗。经济思想在历史渊源上存在一个基本假设,即行动者在心理上彼此独立,他不仅能够独立地做出选择,而且在不受他人影响下决定选择内容(偏好)和选择方法(理性化)。这种心理学上的高度简化受到近来认知理论对于经济理性发展的质疑。

阿可洛夫模型较好地适应了近来对认知与归类的重新解释(Akerlof, 1980)——行动者能够识别周围环境,调整自我以适应不同类型的习俗及习俗要求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时。当阿可洛夫建立自己的逻辑架构时,法国的“风俗学派”(起源于经济学又被纳入社会学)通过对行动者的深入观察也接近了同一主题。他们假设并考察积极而有“效率”的行动者用于建立利益最大化策略的情景资源,包括工具、他人、制度、自然环境等等。他们认为情景应以所有人都明确知晓的方式反复诠释(Storper & Salais 1997: 16)。

## (三)对支付形式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包括两方面内容:不同支付形式之间的关系和经济交易中社会关系的符号寓意。维维安娜·泽尼泽尔将对支付的研究作为经济社会学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她的研究区别了建立在文化、社会关系和制度过程之上的个人主义解释、动机解释及其他种种相关解释(Zelizer, 1985)。

传统的经济交易包括三种主要形式,即礼物、授权和补偿,涉及到礼物交换、民间转移支付和捐赠。当前的研究更进一步扩大到公司组织,确切地说,通过研究20世纪三种补偿形式的扩展来强化对经济交易社会涵义的分析:根据工作时间、工作投入和绩效而进行的正常工资支付;不定期、有选择的奖金、奖品、佣金支付;道德上有争议的酬劳系统(以两性经济行为为代表)。其重点是确定是否还存在其他支付形式以及雇主、雇员如何就组织内部明显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协商谈判。近来,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对因文化及社会关系语境而异的支付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研究。

经济社会学发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社会学家们与如何处理在我们耕耘的土地上每天发生的事情间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比经济社会学本身的发展更为重要。如果经济社会学研究将要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必须使更多的人加入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行列,继续保持多种学科对经济社会学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社会学家必须了解学术领域正在形成的认识。

参考文献:

贝克尔, 1989,《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

- 周长城, 1995, 《谈经济社会学的新进展》, 《社会科学》第 11 期。
- , 1996, 《美国大学社会学专业与社会学研究领域》, 《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 1998, 《当代欧洲经济社会学: 现状与研究主题》, 《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Akerlof, George A. 1980 “A Theory of Social Custom of Which Unemployment May be One Conseq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CIV.
- Arthur, W. Brian 1994 “Inductive Reasoning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 Becker, Howard S. 1960, “Notes on the Concept of Commi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6.
- Hodgson, Geoffrey M. 1988 “The Approa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VI(March).
- Ingham, G. 1996 《剑桥经济学杂志》。
- Jepperson Ronald L. 199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Powell W. W. & P. J. DiMaggio(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Closkey, Deirdre N. 1998 “Quarreling with Ken.”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4(1, winter).
- North, Douglass 1993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9.
- Powell, W. W. & Paul J. DiMaggio 1991, “Introduction.” in Powell W. W. & P. J. DiMaggio(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muels, Warren 1974, *Pareto on Policy*, New York: Elsevier.
- 1989 “The legal-Economic Nexus.”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 57(August).
- 1999 “Theories of Prop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33, No. 1(March).
- Scott, W. R. 1995,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Smelser, Neil & Swedberg, R. (eds.) 1994,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S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torper, Robert & Robert Salais 1997, *Worlds of Production: The Action Frameworks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wedberg, Richard 1993, “Economics and Custom.”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9.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elizer, Viviana 1985,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New York: Basic Books.

作者周长城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经济学博士生  
 吴淑凤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责任编辑: 张宛丽